[清史研究评介]

独辟蹊径的南明史研究

——《南明诸帝》评介

李 尚 英

由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张玉兴教授著的《南明诸帝》一书，是我国史学界迄今第一部关于南明时期各王朝君主传记研究的专门著作。

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延续了277个年头的大明帝国被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农民军推翻，但它却未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散在或逃亡到南方的明朝军政官员、勋贵及地主阶级，拥立明朝宗室为帝，先后建立了南京弘光政权、福建隆武政权、浙江鲁王监国政权、广东绍武政权和西南永历政权，历史上通称为南明。南明史的研究自清初以来的二三百年间历久不衰，自清末以来的近百年间更成为热门话题，但有关南明诸帝传记的专书却一直阙如。近几十年来，明清史的研究是一片热腾景象，系列成书的明清史和明帝、清帝列传相继出版问世。但遗憾的是，作为大明帝国继承人的南明诸帝的研究却未见深入，有关他们的传略更付阙如。正因为此，《南明诸帝》的出版，填补了史学界的一块空白，具有重要意义，颇值庆贺。

《南明诸帝》一书分前言、正文5卷和附录——南明诸帝大事年表，计38万字。全书分别以弘光帝、隆武帝、鲁监国、绍武帝和永历帝为中心，论述他们个人及其周围文臣武将、有关人物的思想活动，从而涵盖了南明各小朝廷从建立到衰亡的全部历史。读毕该书，给人一种耳目一新、别开生面的感受。具体而言，我认为它有以下一些特色。

第一，既把明史和南明史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又突出了南明时期的历史特点。

以往，史学界一般的看法是，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北京陷落、崇祯帝自缢煤山(今景山)，明朝已告灭亡；而南明各王朝尽管苦苦支撑了19年之久，充其量只不过是一小股微光爝火，它的几个帝王更无法与大明历朝皇帝相比拟。也正是这个原因，南明史归属于清史范围，南明诸帝也就理所当然地被摒弃于明代诸帝之外。作者在该书《前言》中对此指出："揆诸情理，如此处置非所宜也。"作者认为，崇祯亡国，明朝并未灭亡。这是因为：第一，明朝的正统与帝系已完全由南明所继承和延续。第二，从传承关系和历史发展脉络上看，南明与明朝有着极其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他们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一体。第三，南明诸帝也都公开声称自己是明代祖业的继承人，奉行着明朝的制度。永历帝被吴三桂俘获后提出的落叶归根、身还故国的要求(见该书第466页)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

作者的观点和看法颇有见地，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照此看来，明朝从1368年建国至1662年永历帝被绞死昆明，历时达295年，中经21帝(其中享国只数天的潞王和传说中的韩王不计于内)。

正是出于南明史和明史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一基本观点，作者极为详实、透彻地论述了南明时期的历史特点。第一，清朝方面，清廷自定鼎北京后，抱着统一中国的目的，一直在进行着有条不紊的攻取，并不断获得胜利。第二，农民军的联明抗清虽然策略上是正确的，但由于农民军领袖陷入内部和南明王朝的派系斗争中，而使抗清事业最终走向失败。第三，南明方面由于

继承了明朝后期的各种弊政，南明各王朝的国家机器从一开始就不能正常运转。在清军的强大攻势面前，南明各王朝均疲于应付，每况愈下，形势大坏。南明王朝内部不可开交的各种矛盾和斗争，诸如文臣与武将、官僚政客中的清流与浊流、兵与民、官吏中忠于职守与醉生梦死的入朝与离朝、忠与奸之搏斗与较量，极大地消耗了各小朝廷的有生力量。自 1644 至 1662 年 19 年间尽管一直有充塞世间的同仇敌忾之志和收复失地的壮举，但内耗的加剧和颓风的难挽，早已注定了南明诸帝的悲惨结局。真可谓，时势既能造就英雄，也能违拂人意，毁弃人才。

第二，真实地重现了南明诸帝的历史本来面貌，突出了他们的鲜明个性，对他们的功过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以往的一些南明史著作，把南明诸帝一概写成无才无德、毫无进取心、只知贪婪腐化的昏君，而缺乏具体的分析和研究。张玉兴教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南明诸帝这些历史人物不是采取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的态度，而是把他们既和明代历史相联系，又放到了南明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该肯定时则肯定，该否定时则否定，该鞭挞时毫不容情地鞭挞。

南明诸帝虽然都是生当末世的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但作者却从分析他们各自不同的经历入手，指出他们都程度不同地适应了急剧变化的社会形势，在治国方针、政策上表现出了两重性。例如，对弘光帝，作者指出他从小娇生惯养，放纵无度，是一个典型的纨袴子弟；监国登极后，他被群小包围牵制，养奸贻患，沉缅酒色，荒淫无度，终于导致了灭亡的命运。昏庸是他一生中的主流。然而，弘光帝登极后又表现出了宽容纳物的一面。他颁发诏书宣布国政 25 款，确如作者所分析的："大有与民更始、咸与维新的气象"。(第 20 页)他还一度重用过东林党等清流人士，这些说明弘光帝是一个欲有所为之君。作者的研究和分析表明，弘光帝想有为，又难有为，终于昏昏然而无所为，以致断送了国家，断送了个人和忠良正直之臣的生命。

又如，对隆武帝，作者指出，他在明末诸王中是一位很有个性和棱角、十分引人注目而又颇有争议的佼佼者。他自幼家庭多难，遭遇坎坷，噩运接踵，因而做了南明皇帝后就成为一个"很有思想和见解，胸怀大志，励精图治之人"(第 159 页)。作者依据大量确凿的史料，翔实而又明白无误地叙述了隆武帝为恢复明朝的一统江山而做的种种努力：他从接受监国到登极，一而再、再而三地颁诏表达抗清的壮志；为实现这种壮志，他一方面决心亲征，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和行动，另一方面又一反弘光帝全力镇压农民军的作法，招抚大顺农民军余部，开了南明王朝联合农民军抗清的先河。但当抗清壮志和行动一再受到群小的阻挠，隆武帝又毅然以身殉之。临危前，他竟运书数十车，活现一个孜孜求治、时时奋进之君。

再如，对永历帝，人们一般把他看作优柔寡断、毫无作为、闻警即逃之人。作者对此不仅不加任何隐讳，相反却着力刻画，并大加挞伐和谴责。但作者又指出，永历帝也希望能当个"好皇帝"(第 305 页)，即位伊始的诏书和当时人望及忠义之士的依附也说明了这一点。另外，作者在叙述了永历帝君臣历经千辛万苦逃离孙可望的虎口后，指出永历帝对孙可望不仅不大张挞伐，却予以极大宽容，采取各种措施争取孙可望、弥合孙可望和李定国的矛盾。这种令当时许多群臣震惊不已的举动，确实表达了永历帝中兴明朝的愿望和决心。

第三，围绕南明诸帝，对有关人物的思想和行动也尽情剖析和论述，从而使人们加深了对传主和南明历史的了解。

一个封建帝王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大小、好坏，本人固然是关键，但其辅佐之臣也不容忽视。隆武帝的权臣郑芝龙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作者指出，郑芝龙兄弟是隆武朝的开国元勋，隆

武帝即位后被委以重任，一家人荣耀至极，掌握了朝廷内外大权。但是，郑芝龙兄弟并不把隆武帝放在眼里，而是我行我素，专横跋扈，僭越不臣之事比比皆是。他们不仅搞乱了朝廷，欺压百姓，对隆武帝的亲征横加掣肘，而且为了给自己降清铺平道路，毅然撤掉仙霞岭防务，使清兵不费吹灰之力就颠覆了隆武政权。隆武帝对此却毫无办法，终使抗清壮志难酬。当然，隆武帝不是不想踢掉这块绊脚石，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是形势使然，"败局已成，回天无力，难有作为"（第159 页）。

作者对永历帝的文武群臣瞿式耜、陈子壮、马吉祥等人作了多方面深入的刻画和描写，指出，瞿式耜、陈子壮等人一再为永历帝设计谋，找出路，创造和发展抗清的大好形势，但永历帝根本听不进，闻警即逃。这就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永历帝不顾国家利益、时刻以个人安危为首位的丑态。作者还指出，永历权臣马吉祥是一个早已丧尽天良、作恶多端之人，多次把永历帝逼入绝境。永历帝对此也深有体会。但当群臣弹劾马吉祥、甚至要杀他时，永历却又犹豫起来，继续加以重用。这又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永历帝优柔寡断、懦弱和毫无主见。

第四，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优秀史学传统，自觉地承担起史学家的社会责任。

中国的优秀史学传统之一，就是治史以尊重史实为主。南明史料繁多庞杂，且彼此歧异，往往令人望而却步。张玉兴教授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严谨扎实的治学态度，从众多纷杂的史料中理出头绪，在许多问题上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例如，鲁监国的生年和卒年，就是作者重新考证出来的，与现行记载不同。又如，一般史书均谓朱由榔在称永历帝之前为桂王，作者以确凿的史料证明就是永明王（第 301 页）。再如，作者一反史学界的传统看法，将永历帝致吴三桂书的时间确定为永历帝被执回昆明后，而不是其在缅甸被俘时，颇为允当。

中国的另一个优秀史学传统，就是史家写乱世之史不忘史责，注意褒善贬恶。作者在该书中尽量做到这一点。如写广东三忠之尽节，瞿式耜、张同敞殉国之从容，张煌言百折不挠之斗志，刘宗周、黄道周之满腔正气，均给人以激励和爱国主义教育。

中国的再一个优秀史学传统，就是贯彻"以史为鉴"、"以人为鉴"的治史宗旨。作者通过撰著南明诸帝传略，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用以启迪人生，使读者从中获取丰富的教益。例如，南明诸帝都是明朝后期腐败时代培养出来的人物，他们身上始终散发着腐败习气。掌权后，总的来说既不以国家利益为重、又无驾驭政治之才能，国焉能不亡在他们的手中？

本书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例如，接续明朝之统治者还有一个潞王，时间虽短（只有几天），但从系统性和完整性而言，似应列出专章（或专节）加以叙述。另外，本书在编排和校对方面也有一些值得改进之处。

最后，我们应该感谢吉林文史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他们以过人的胆识，出版了这套《明帝列传》丛书，这对进一步推动明史研究、尤其是明代帝王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